

#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作用：群体情绪与效能路径\*

薛婷<sup>1</sup> 陈浩<sup>2</sup> 乐国安<sup>2</sup> 姚琦<sup>2</sup>

(<sup>1</sup>天津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 天津 300193) (<sup>2</sup>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天津 300071)

**摘要** 为探究多元社会认同如何通过群体情绪、自我和群体效能路径, 影响现实或网络集体行动参与, 研究者分别以中日撞船事件、利比亚事件和就业性别歧视现象为背景蓝本, 开展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 结果发现: 群体愤怒情绪主要对现实集体行动有显著影响, 效能感对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皆有显著影响; 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 通过情绪路径或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 与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则只通过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 两类社会认同与两条路径之间是调节而非中介关系。不同事件背景与不同行动场域下的综合分析表明网络集体行动参与决策更具工具理性特征。

**关键词** 集体行动; 社会认同; 多元认同; 群体情绪; 效能感

**分类号** B849:C91

## 1 引言

如果某人像所属群体典型成员那样去行动, 且其行动旨在改善所属群体状况, 那么他/她即是投入到了集体行动中(Wright, Taylor, & Moghaddam, 1990)。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s)和效能感(efficacy), 已成为社会心理学家公认的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三大因素(陈浩, 薛婷, 乐国安, 2012)。三者对集体行动参与的整合作用方式和相互关系也逐渐受到学者重视(Mummendey, Kessler, Klink, & Mielke, 1999;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 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 Leach, 2004)。整合研究对于确定社会认同、群体情绪和效能感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但这些研究通常只涉及三大变量各自的单一层面或单一种类, 并多以个体对所属弱势群体认同感水平高低来解析其对群体情绪和效能感变量的作用。近年来, 有关三大变量各自独立路径的研究开始尝试在层次或种类上进行拓展, 而集体行动的发生场域也从

现实情境逐渐扩展到网络情境, 这些都为本研究假设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路。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从扩展变量层次(或种类)和行动场域的角度, 对以往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解释框架进行拓展, 通过基于不同事件和不同方法的探索, 进一步挖掘不同层次社会认同(多元社会认同)、群体情绪和效能感在影响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时的作用方式和相互关系, 其中重点分析多元社会认同的影响机理。

本研究力图通过对以下假设的检验和分析来实现最终的研究目的。

研究假设 1: 社会认同作为基础性变量, 不同层次社会认同既可以对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或实际行动产生直接影响, 也可通过群体情绪和效能感对其产生间接影响。

Tajfel 和 Turner (1986)在提出社会认同理论之初就曾指出, 当个体对内群体抱有强烈的认同感, 并且认为目前的群际关系是不公平和不稳定时, 更可能参与到以改变群体现状为目标的集体行动中。后续研究则逐步明确了情绪(主要指愤怒)和效能感

收稿日期: 2012-06-21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课题(2010CB7314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1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ASH006)、天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TJXX12-08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YJA190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1YJC190004、10YJJCX19005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SH043)资助。

通讯作者: 陈浩, E-mail: hull1919@gmail.com

作为不公平感和不稳定感的重要指标对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Kelly & Breinlinger, 1995), 并开始将社会认同作为影响集体行动参与和其它变量的基础性因素, 通过不同方法和不同背景事件探讨以群体情绪为代表的感性路径和以效能感为代表的理性路径间的相互关系, 对三大影响因素进行整合性分析。Mummendey 等(1999)对德国统一后东德人的研究发现, 社会认同和群际行动策略之间, 受到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两条路径的完全中介作用, 且两条路径彼此独立; 其整合性分析模型对 6 种群际行动策略的解释率从 3%到 38%不等。Van Zomeren 等(2004)采用“大学学费涨价事件”范式, 通过实验法对社会认同水平进行操纵后发现, 基于工具性社会支持的群体效能(感), 和基于过程性公平和情感性社会支持的群体愤怒情绪, 是影响集体行动参与的两条彼此补充但独立的路径。它们分别代表了人们处理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 问题聚焦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和情绪聚焦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

之后, Van Zomeren 等(2008)对 2007 年 6 月之前的集体行动研究中的 182 个独立样本结果进行元分析, 提出整合的集体行动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SIMCA)。该模型中社会认同、不公平感(等同于群体愤怒情绪)和效能感都能独立地解释集体行动参与。其中, 社会认同除了对集体行动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外, 还能通过(群体)不公变量和(群体)效能变量间接影响集体行动参与。社会认同能够作用于不公变量, 是因为它提供了不公体验的群体分享基础, 能正向缓冲群体成员抗拒低地位现状的负向影响, 并在情感上激发出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社会认同能够作用于效能变量, 是因为较强的认同感能向相对无力的个体“灌能”(empowerment)。换句话讲, 社会认同影响群体成员在群体不公和集体效能上的体验。因此 SIMCA 模型认定, 社会认同变量能以调节变量的角色, 在不公和效能两变量间起概念桥梁作用。本研究则进一步从扩展变量层次和种类的角度对此结论进行检验和发展。

研究假设 2: 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 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 主要通过情绪路径影响人们的集体行动参与, 而与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 则主要通过效能路径影响人们的集体行动参与。

社会认同作为联结微观个体心理和宏观群体

心理的重要心理机制, 除对人们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基础性影响外, 其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多元性, 即在任何具体语境中, 行动者都同时禀赋多元群体成员身份资格。对此, 在社会认同理论上发展出的“自我分类理论”就曾按照认同的抽象程度, 将人们所具有的一系列自我认同表征划分为个体水平的认同、群体水平的认同和人类水平的认同, 并强调这里的群体不仅指客观存在的群体, 还包括心理意义上的主观群体(杨宜音, 2005)。而某一或某些群体成员身份能够被激活, 则是个人特征与情境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李春, 宫秀丽, 2006)。一些研究者通过考察移民或政治变革地区的人们对多种民族和政治身份的认同现象, 探讨这些同时存在的多元认同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Klein, Spears 和 Reicher (2007)对移民的研究发现, 保持多元认同的可能性往往取决于与可见的不同群体成员的社会关系, 而其对不同规范的遵守表明了其对不同群体的认同。Hong 等(2006)在 1997 年香港回归前后通过两个纵向研究, 同时考察了香港人身份和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及其对相关社会态度的影响。

集体行动领域关注最多的则是与行动触发关系密切的两类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 一是与事件相关的、大范畴群体成员身份的社会认同, 如国家认同、性别认同等; 一是与活动组织方或相关政治身份的认同, 如对工会的认同和对女权主义者的认同。这两种认同之所以受到众多集体行动研究者的青睐, 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可能解释了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不同阶段的心理机制, 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参与意向和实际行动具有不同质上的或量上的影响。根据 Klandermans 和 Oegema (1987)提出和验证的社会运动参与“四步骤模型”, 个体参与特定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步, 人们由于同情某项运动的政治或策略性目标, 而成为该运动的潜在动员目标, 但这时还只是态度支持; 第二步: 人们正式成为该运动的动员目标; 第三步: 通常在特定组织的动员和宣传下, 人们产生了参与特定集体行动的动机; 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 人们冲破重重障碍(比如时间、金钱、可能坐牢的危险, 或承担其它责任)参与集体行动。后续的研究发现, 相对于对更广泛动员类别或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如老人、同性恋), 与某一运动或组织的认同(如灰豹组织、同性恋运动)对行动参与意向的预测作用更大(Simon et al., 1998; Stürmer &

Simon, 2004)。结合社会认同、计划行为理论等(Ajzen & Fishbein, 1977), 这一发现提示我们, 与所处弱势群体的认同, 可能主要是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触发了人们潜在的参与意向(Greene, 2004; Simon & Klandermans, 2001), 从而影响人们参与行动的前两个阶段; 而与行动组织方或特定政治身份的认同, 则由于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态度、行为准则和行动资源, 从而激发了人们作为“活动家”或代理者的身份, 增加了人们参与行动的“内在责任感”(Van Zomeren, Postmes, et al, 2008), 并且也是个体计算利害得失和成功可能性的基础, 即对应于四步骤模型的后两个阶段(Simon et al, 1998; Stürmer & Simon, 2004)。但上述有关两种认同影响机制的解释还只是一种理论猜想, 鲜有研究通过综合群体情绪和效能感等变量对其进行实证检验。Van Zomeren, Spears 和 Leach (2008)的情境模拟实验发现社会认同能够促进情绪, 并调节着效能感对集体行动参与意向的影响, 但该研究只涉及一种水平的认同。Kelly 和 Breinlinger (1995)研究发现, 相对于对女权主义者的认同, 对女性的认同能够调节不公平感对集体行动实际参与的影响。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以往有关两个层次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参与影响的少量探索, 多为基于西方“社会运动社会”背景下的研究(冯仕政, 2003)。中国社会甚少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专业组织, 因此, 由于缺乏成熟和明确的与集体行动相关的行为准则和目标, 在中国背景下所激发的对行动组织方的认同, 可能主要引发人们对个体和集体行动力的考量。也就是说, 两个层次的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参与影响程度上的差异, 作为一种表象可能不会出现在中国行动背景之中。以往研究也曾发现, 相对于对女性群体的社会认同, 对女权主义者的社会认同只对部分类型的集体行动有较强预测力(Kelly & Breinlinger, 1995)。因此, 研究假设 2 试图揭示的是不同层次社会认同在集体行动参与影响机制上的本质差异。

研究假设 3: 群体愤怒对集体行动有普遍的促进作用, 害怕情绪对集体行动的作用可能依具体事件和行动情境而不同。

在情绪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ies of emotion)和社会认同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 Theory, IET), 已成为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Gordijn, Wigboldus, & Yzerbyt, 2001; Mackie, Silver, &

Smith, 2004)。群际情绪的主要特征就是个人会对那些没有对自身带来任何影响, 但对群体其他成员或群体带来影响的事件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有研究发现, 群体水平的愤怒强度与认同水平呈正相关, 并会引发对外群体的攻击和对抗意向(Leach, Iyer, & Pedersen, 2007; Mackie, Devos, & Smith, 2000)。对于集体行动而言, 群体情绪(尤其是群际愤怒情绪)是群体状况评价与特定集体行动反应倾向间的桥梁(Dumont, Yzerbyt, Wigboldus, & Gordijn, 2003; Van Zomeren et al., 2004)。当个体对某一群体产生认同时, 群体身份就会成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在群际背景下, 个体对情境的认知评价会以群体为基础, 将内群体和外群体作为情绪的反应目标(Gordijn et al., 2001; Neuberg & Cottrell, 2002)。

基于相对剥夺感的研究历史, 以往研究大多探讨群体愤怒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其促进作用也已获得共识(Leach et al., 2007; Mackie et al., 2000)。Van Zomeren 等(2004)的实验研究发现, 愤怒调节着集体不利和抗争意愿之间的关系。Wright 等(1990)的实验研究也发现, 愤怒和怨恨情绪会增加参与者选择反常规行动作为对歧视性对待的反应。近来的研究也开始关注害怕、同情等其它群体情绪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 但结论不一。譬如, 研究者普遍认为害怕主要与回避性反应有关, 因此对集体行动有抑制作用(Mackie et al., 2000; Roseman, 1984), 但也有研究表明害怕情绪会促进集体行动参与倾向(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10)。这种矛盾可能归因于事件背景和行动情境的差异, 因此有必要对害怕情绪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 进行跨事件背景和跨行动情境的验证性分析, 尤其是将之与愤怒放在同一框架中一起考察。

研究假设 4: 自我效能感和群体效能感对集体行动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规律。

虽然效能感一直作为集体行动中理性路径的重要代表, 但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效果却仍未统一, 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往往混淆了群体效能和个体效能对集体行动的差异性影响。群体效能主要是指对是否有足够数量的人能够被动员起来去实现集体目标的感知(Berman & Wittig, 2004), 或是对群体是否有能力带来所期望改变的能力的直接预期等(Fox & Schofield, 1989), 而个体效能主要是指个体对政治过程影响能力的个人感知(Locatelli & Holt, 1986), 或是指个体对成功实现集体目标贡献程度的感知(Schofield & Pavelchak,

1989)。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集体行动研究先驱 Klandermans (1984)在提出资源动员理论的社会心理扩展模型之初,就指出自我效能和群体效能应分开独立分析。Bandura (1997)也强调集体效能并非自我效能的简单相加,两者是各具自身独特特征的效能概念。一些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两者各自对不同集体行动的影响(Bandura, 1997; Brunsting & Postmes, 2002; Tyler & McGraw, 1983; Wolf, Gregory, & Stephan, 1986)。有一些基于核战争问题的研究发现,对个体效能(如个人的行动能够带来改变)的主观感知与行动意向之间存在中到高度的配对相关(Tyler & McGraw, 1983; Wolf et al., 1986)。而 Van Zomeren 等(2004)的双路径模型则指出工具性的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影响集体效能进而对人们的集体行动意愿产生影响。Bandura (1997)的研究也发现,集体的政治效能和对政府的信任能够预测人们采取政治活动的水平和形式,效能感和信任感都强的人倾向于参与传统的政治活动,而那些相信通过持续的集体努力能够实现社会变革但不信任政府和官员的人们,则倾向于选择反传统的、对抗性或强制性的政治活动。

但很少有研究同时考察两种效能感对集体行动的作用程度和影响机制,因此,为进一步扩展前人研究成果,本研究试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同时关照它们对于集体行动参与的各自独立影响。

研究假设 5:相对于现实情境,人们在网络情境下的集体行动决策更趋理性。

目前有关集体行动的研究已经将行为发生的环境由现实扩展到网络,并试图探讨行动场域与各主要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集体行动的影响(Giguère & Lalonde, 2010; Reicher & Levine, 1994; Reicher, Spears, & Postmes, 1995; 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08)。Reicher 等人提出的“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SIDE)”通过实证研究和元分析来反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去个性化理论”,指出匿名性、群体规模和自我觉察等去个性化操作,几乎不影响那些违背一般社会规则的行为(如反社会行为),反而增加了个体对情境性规则的遵守,这是因为网络的匿名环境更能够激活特定的社会认同,促使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表现出遵从群体规范的理性特征(Giguère &

Lalonde, 2010; Reicher & Levine, 1994; Reicher et al., 1995)。Spears, Lea 和 Lee (2011)的研究发现,当参与者视觉匿名且群体成员身份突出时,随着群体讨论的进行,出现了明显的群体极化现象;而当参与者非匿名时,即使群体成员身份突出,也没有出现群体极化现象。Brunsting 和 Postmes (2002)对荷兰环境保护者的研究就发现,与现实集体行动相比,网络集体行动更多地受到基于行动效果和自我效能的理性计算的影响,受认同调节的群体情绪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认同和相对剥夺感等情绪因素,对人们的现实集体行动参与倾向有着更为显著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试图通过三项基于不同背景事件、逐步递进的实验对上述假设进行逐一检验,首先通过以“中日撞船事件”为背景的研究(实验 1),建立综合三大变量的整合模型以对假设 1 进行初步检验,并通过对具体路径的分析初步揭示不同层次或类型的社会认同、群体情绪和效能感在影响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参与时的相对作用和相互关系(假设 2 至假设 4),通过对现实和网络情境下整合模型比较,探讨不同行动场域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假设 5)。随后开展的以“利比亚事件”为背景的研究(实验 2),则试图通过不同性质的背景事件与更加完善的问卷设计,对实验 1 的相关结果进行检验。最后,在总结前两项研究所反映的多元社会认同影响集体行动的路径规律基础之上,通过以某高校的反就业性别歧视宣传活动为背景的研究(实验 3),进一步探索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与效能和情绪路径间的关系和可能的因果机制,从而对假设 2 做更深入的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对三个背景事件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其不同的性质特征,有助于归纳出更为普遍性的结论和规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克服以虚拟事件(如大学学费涨价)为背景的典型研究范式的各种弊端。以真实事件为背景,既继承了西方集体行动研究传统,更有助于集中探讨和揭示中国社会现实及其所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学学理意义。

## 2 实验一:探索多元社会认同对群体情绪和效能路径的不同作用

实验 1 以 2010 年 9 月 7 日发生的“日本巡逻船钓鱼岛冲撞中国渔船事件”(以下简称“中日撞船事件”)<sup>1</sup>及后续事态发展整个过程为背景蓝本,通过

<sup>1</sup>注:事件具体过程详见百度百科“日本巡逻船钓鱼岛冲撞中国渔船事件”词条内容:<http://baike.baidu.com/view/4305781.htm>。

问卷法初步探索不同层次社会认同(国家认同、学校认同或网络认同)、群体(愤怒)情绪与自我和群体效能感对人们参与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机制及其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者之选择以该事件为背景蓝本,是因为其为当时中日两国瞩目的群际冲突热点事件,并且不涉及个体层面的客观利益。虽然施测时事件的高潮已过,但由于该事件具有深远的民族历史渊源,仍较易激发被试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情绪。并且社会认同具有情境依赖性特点,也便于研究者创设相应的情境使人们的特定群体身份及相关认同变得凸显,从而对其感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Turner et al., 1987),而受情境激发的社会认同对人们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也正是本研究的一个重点。基于此,为尽量弥合被试间的背景知识差异,并减少时间迟滞对被试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者首先整理了国内有关该事件的发展始末、最新进展和后续问题的权威媒体报道。

## 2.1 研究方法

### 2.1.1 研究被试

随机选取了天津市某大学的本科生为研究被试,共发放问卷 240 份,收集有效问卷 216 份,问卷回收成功率 90.00%。其中男生 83 人,女生 121 人,12 人性别未填。年龄跨度为 17 岁到 23 岁,平均年龄 20 岁( $SD=1.25$  岁)。涉及传播学、环境科学、心理学等 7 个专业,文科类和理科类学生各 108 人。

进一步分析显示,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研究被试在性别( $\chi^2=2.41, df=1, p=0.16$ )、专业( $\chi^2=0.07, df=1, p=0.79$ )上的人数比例无显著差异,但在年级上的差异显著( $\chi^2=31.93, df=2, p<0.05$ )。

### 2.1.2 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在教室内对被试进行统一施测,采用统一的指导语,指导语中通过指出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大学生对重大国际事件的个人看法”来掩盖研究的真实目的,同时强调匿名和保密原则来减少被试的顾虑。

随机发放两种情境下的集体行动倾向性的调查问卷(现实情境和网络情境),每位被试只回答其

中的一份,两种问卷除具体的行动形式和对组织认同的测量(现实情境为学校认同,网络情境为网络认同)有所不同外,其它测量项目都相同。

当场作答和回收问卷,并提醒被试按自己的想法作答,不要相互讨论。收集的数据使用 SPSS 13.0 和 Lisrel 8.70 进行分析。

### 2.1.3 研究工具

问卷的第一部分包括了指导语和对“中日撞船事件”始末及最新进展的介绍材料。时间从 2010 年 9 月 7 日至 2010 年 10 月 20 日,根据事件进展汇编了一份 1000 字左右的新闻材料,修改了其中具有态度偏向性或暗示性的言辞,尽量从中立角度对事件进行介绍。其次,参考西方以往相关研究,筛选出较为经典且国内适用的测量题目。通过在目标人群中选取 150 人进行初测(这些被试不再参与正式施测),回收有效问卷 140 份。根据初测结果修改材料,并酌情删除严重影响内部一致性信度或标准差过小的题目,得到最终的施测问卷。问卷题目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社会认同:实验 1 涉及两个层次的社会认同:国家认同,代表对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学校认同或网络认同,代表对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参照国外经典研究范式(Simon et al., 1998; Smith, Seger, & Mackie, 2007)并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初测结果,选择并修改了题目,用于不同层次社会认同(多元社会认同)的测量。测量国家认同的题目为:“‘中国人’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喜欢‘中国人’这个身份”,“我以身为一名中国人为荣”;测量学校(网络)认同的题目为:“作为某校(人人网)的一员是我的一个重要身份”,“我喜欢某校的学生(人人网成员)这个身份”,“我以身为某校的一员(人人网的成员)而自豪”。采用 5 点 Likert 式量表对上述陈述进行评定(从 1 代表“非常不同意”至 5 代表“非常同意”)。测量结果显示国家认同、学校认同和网络认同 3 种认同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0.90 和 0.92,表明信度良好。

表 1 不同行动情境下的样本分布

情境	性别		年级				专业	
	男	女	一	二	三	四	文科	理科
现实	45	57	74	12	14	6	54	54
网络	38	64	40	16	44	8	54	54
合计	83	121	114	28	58	14	108	108

(2) 群体情绪：本研究主要考察群体愤怒情绪对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让被试在阅读材料后，从“中国人”的角度对愤怒的感受进行5点 Likert 式评定(从第1级“完全没有”至第5级“非常”) (Smith, Seger, et al., 2007; Van Zomeren et al., 2004; Yzerbyt, Dumont, Wigboldus, & Gordijn, 2003)。

(3) 效能感：效能感划分为2个层次：自我效能感和群体效能感。根据 Klandermans (1984)和 Bandura (1997)的定义和研究，本研究中测量自我效能感的题目为“我参与该活动都不会有什么区别”，“我参与该活动是有重要意义的，这表达了我对活动的支持”，采用5点 Likert 式量表对上述陈述进行评定(从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5代表“非常同意”)。前者采取反向计分方式，后者采取正向计分，均值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强，其在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50和0.68。测量群体效能感的题目最初为对参与行动人数的估计，以及对许多人参与时行动成功的可能性估计。但根据初测结果，这一部分最终只保留对参与人数估计的题目，同样采用5点 Likert 式评定(从1代表“非常少”至5代表“非常多”)。对两种效能感的测量都放在集体行动情境具体描述后进行。

(4) 行动倾向：实验1中设置了2类集体行动情境，现实情境和网络情境中的集体行动。现实集

体行动形式是学生所在大学组织的集体示威活动(地点：日本驻华大使馆，时间：一天，需要自行支付一定费用)。网络集体行动形式则是中国大学生社交网站“人人网”<sup>2</sup>组织的网上集体实名签字抗议活动，签名信将寄至日本驻华大使馆。每套问卷只涉及一种集体行动，让被试对自己参与该行动的可能性进行5点 Likert 式量表评定(从1代表“完全不可能”至5代表“完全可能”)。

问卷的最后还询问了被试的性别、年级和所在院系等人口学变量信息。

## 2.2 结果

### 2.2.1 各变量在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初步分析

表2为现实情境下不同层次或种类的社会认同、效能和愤怒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初步分析发现，被试在各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上的得分皆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 $t_{\text{国家认同}}(100)=0.44, p=0.66$ ;  $t_{\text{学校认同}}(97)=0.61, p=0.54$ ;  $t_{\text{愤怒}}(99)=0.93, p=0.35$ ;  $t_{\text{自我效能}}(99)=0.00, p=1.00$ ;  $t_{\text{集体效能}}(99)=0.00, p=0.99$ ;  $t_{\text{行动倾向}}(99)=1.07, p=0.29$ ]。

表3为网络情境下不同层次或种类的社会认同、效能和愤怒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初步分析同样显示，被试在各自变量和因变量

表2 现实情境下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及各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 $n=108$ )

<i>M</i> ( <i>SD</i> )	国家认同	学校认同	愤怒	群体效能	自我效能	行动倾向
国家认同	4.62 (0.65)					
学校认同	0.30**	3.85 (0.78)				
愤怒	0.21*	0.14	4.34 (1.02)			
群体效能	0.32**	0.27**	0.15	3.56 (0.95)		
自我效能	0.30*	0.35**	0.34*	0.45**	3.60 (0.86)	
行动倾向	0.14	0.21*	0.15	0.61**	0.49**	3.31 (1.13)

注：\*  $p < 0.05$ , \*\*  $p < 0.01$ , 下同。

表3 网络情境下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及各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 $n=108$ )

<i>M</i> ( <i>SD</i> )	国家认同	网络认同	愤怒	群体效能	自我效能	行动倾向
国家认同	4.62 (0.60)					
网络认同	0.15	3.06 (0.90)				
愤怒	0.37**	0.13	4.33 (1.00)			
群体效能	0.29**	0.12	0.42**	4.14 (0.76)		
自我效能	0.27**	0.33**	0.38**	0.61**	3.89 (0.78)	
行动倾向	0.38**	0.30**	0.35**	0.65**	0.53**	3.92 (1.00)

<sup>2</sup>注：网址为 [www.renren.com](http://www.renren.com)

上的得分皆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 $t_{\text{国家认同}}(103) = -1.82, p = 0.07$ ;  $t_{\text{网络认同}}(104) = -1.82, p = 0.07$ ;  $t_{\text{愤怒}}(103) = 0.64, p = 0.53$ ;  $t_{\text{自我效能}}(103) = -1.75, p = 0.08$ ;  $t_{\text{集体效能}}(103) = -1.67, p = 0.10$ ;  $t_{\text{行动倾向}}(105) = 0.75, p = 0.46$ ]

### 2.2.2 社会认同、群体情绪和效能感对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路径模型建构

对实验 1 的数据首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组比较技术来对测量工具的信效度进行检验, 并对潜在变量的平均值以及具体的路径系数进行比较和分析。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检验测量工具的恒等性, 有助于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它考虑到潜在变量的平均数, 而潜在变量往往是研究的真正兴趣所在; 能考虑到各种测量误差, 使估计的路径参数值更为准确; 能够处理只有部分测量等同的跨组比较问题(Vandenberg & Lance, 2000;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2004)。

首先, 按照研究假设 1 建立整合模型, 即不同层次社会认同既可以对行动倾向产生直接影响, 也可通过群体情绪和效能感对行动倾向产生间接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作为潜变量的群体愤怒情绪、集体效能和行动倾向都只有单一的测量指标, 此处采用的是将因子负荷设为 1, 指标的误差方差设为 0 的处理方式进行结构方程建模(侯杰泰等, 2004)。

然后, 通过对现实和网络情境的单独分析和共同分析, 检验该模型在两种情境下的适用度。在此基础上, 通过因子载荷、因子方差和协方差等恒等性设定检验测量工具的信效度, 并进一步对潜在变

量的均值和各路径系数进行比较, 分析归纳出各主要因素在不同情境下的影响规律, 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4 和图 1、图 2。

由表 4 可知, 不管是单独分析还是共同分析, 假设模型在两种情境下的拟合都很好, 但现实情境下的拟合更优。 $M_2$  与  $M_1$  相比,  $\chi^2$  增加不显著( $\Delta\chi^2 = 19.42, \Delta df = 11, p > 0.05$ ), 说明国家认同、愤怒、自我效能、群体效能和行动倾向的测量指标在两种情境下具有一定的恒等性, 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均值比较和路径系数分析。在  $M_3$  中, 将现实情境下各潜在变量的均值设为 0, 网络情境下各潜在变量的均值自由估计, 结果发现, 后者的均值与 0 均无显著差异, 并且相对于  $M_2, M_3$  的  $\chi^2$  增加也不显著( $\Delta\chi^2 = 8.30, \Delta df = 5, p > 0.05$ ), 反映出上述潜变量均值的跨组恒等性。

由图 1 和图 2 可知, 在满足测量工具恒等性前提下, 两种情境的整合模型具体路径系数和显著性有所差异: 现实情境下的整合模型中, 学校认同和自我效能对行动倾向的直接作用显著, 国家认同对群体效能、学校认同对自我效能的影响显著, 整合模型可解释行动倾向的 56% 的变异量。网络情境下的整合模型中, 群体效能对行动倾向的直接作用显著, 国家认同对愤怒、自我效能和群体效能, 以及网络认同对自我效能的影响显著, 整合模型可解释行动倾向的 56% 的变异量。

但  $M_4$  的拟合结果显示(与  $M_2$  相比,  $\Delta\chi^2 = 26.77, \Delta df = 16, 0.01 < p < 0.05$ ), 各路径系数间的差异并没有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 暗示了各因素间的关系具有一定跨情境恒等性。

表 4 多组比较分析中各模型的拟合指数

模型	$\chi^2$	df	$\chi^2/df$	RMSEA	NFI	NNFI	CFI	IFI	GFI
$M_{\text{现实}}$	40.70	34	1.20	0.04	0.94	0.98	0.99	0.99	0.93
$M_{\text{网络}}$	48.35	34	1.42	0.07	0.92	0.95	0.97	0.97	0.92
$M_1$	89.04	68	1.31	0.06	0.93	0.96	0.98	0.98	0.92
$M_2$	108.46	79	1.37	0.06	0.91	0.96	0.97	0.97	0.90
$M_3$	116.76	84	1.39	0.06	0.91	0.95	0.96	0.96	0.91
$M_4$	135.23	95	1.42	0.07	0.89	0.95	0.96	0.96	0.89

注:  $M_{\text{现实}}$  为假设模型在现实情境下的单独分析

$M_{\text{网络}}$  为假设模型在网络情境下的单独分析

$M_1$  为假设模型在两种情境下的同时分析, 但不设限制

$M_2$  在  $M_1$  的基础上设定国家认同、愤怒、自我效能、群体效能和行动倾向等潜在变量与其测量指标间的因子负荷以及上述潜变量的方差和协方差在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相等同

$M_3$  在  $M_2$  基础上设定指标截距等同, 比较潜在因子的平均数在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差异

$M_4$  在  $M_2$  基础上设定各路径系数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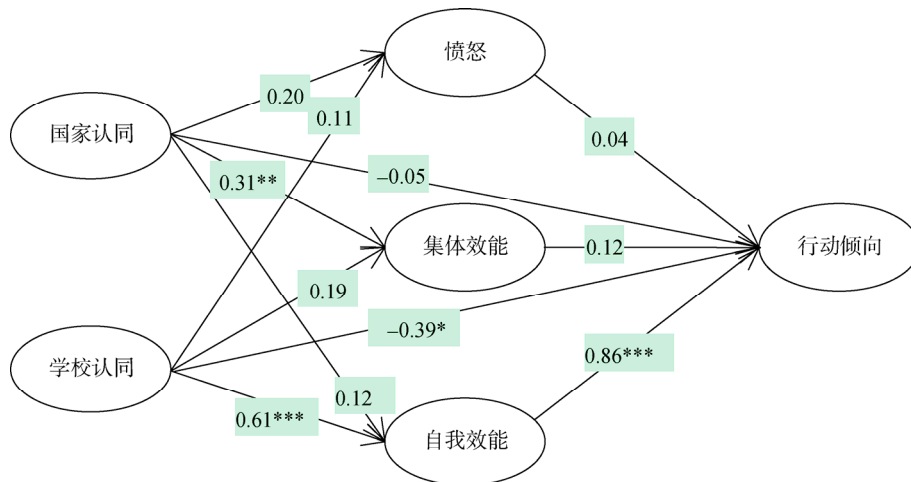


图 1 现实情境下的集体行动参与整合模型

注: 图中的路径系数为跨组完全标准化解 (common metric completely solution standardized), 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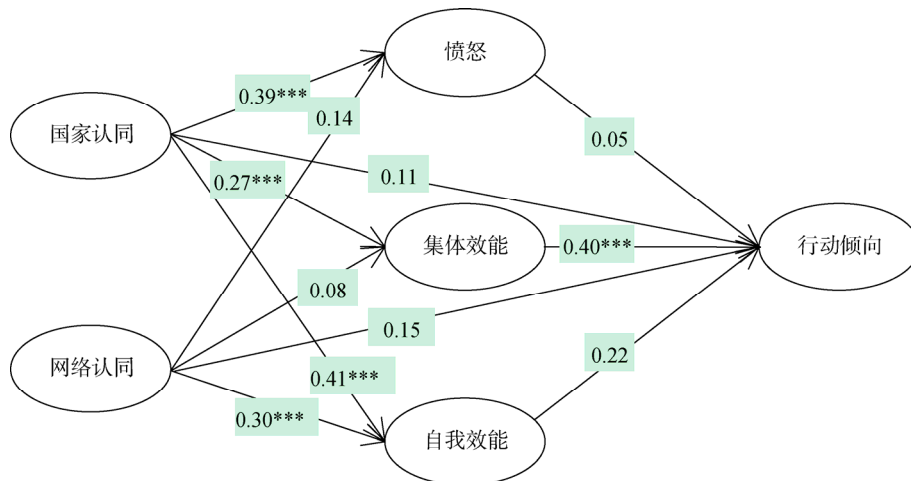


图 2 网络情境下的集体行动参与整合模型

### 2.3 讨论

实验 1 以“中日撞船事件”为背景, 对多元社会认同、不同种类效能感和群体愤怒情绪对人们参与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 对本研究相关假设进行了初步的检验。

结果发现, 以国家认同与学校认同(网络情境中为网络认同)两个层次的社会认同作为基础性变量的整合模型, 在现实和网络情境下拟合都较为理想, 皆可解释行动倾向 56% 的变异量。但具体路径中, 两种认同对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并非都显著, 因此假设 1 得到部分验证。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 愤怒在两种情境下对行动倾向皆无显著影响, 假设 3 没有得到验证。效能感的直接作用都很显著, 但不同效能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不同作用使得假设 4 只得到部分验证(Mummendey et al., 1999;

Van Zomeren et al., 2004; Van Zomeren, Postmes, et al., 2008; Van Zomeren et al., 2010)。

从两种社会认同对行动倾向的影响程度和作用路径来看, 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对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 比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群体类别认同, 对行动倾向的影响程度更大的结论, 只在现实情境中获得了验证, 暗示了以往研究结论的局限性和网络情境的特异性。但两种认同在两个行动场域下的作用路径却体现出一定规律性: 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国家认同), 可以通过情绪或效能路径显著影响行动倾向, 而与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学校认同或网络认同), 只通过效能路径显著影响行动倾向, 这既是对研究假设 2 的检验和发展, 也有助于揭示效能路径和情绪路径的真正源头。



### 3 实验二: 多元社会认同对群体情绪和效能路径不同作用检验

实验 1 虽然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部分假设, 但仍有一些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和本研究假设不符。这些差异是否可归因于不同背景事件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而且单一的事件背景和单一类型的情绪变量无法完全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对一些假设的检验不够充分。此外, 实验 1 中一些维度采用单指标测量, 以及样本量的大小, 都可能影响模型的拟合。因此, 为进一步检验实验 1 的研究发现, 并对研究假设做更深入的验证, 研究者以不同性质的“利比亚事件”<sup>3</sup> 为背景蓝本开展了第二项研究(实验 2), 尝试通过扩大样本来源、数量, 增加单一维度的测量项目等方式对研究方法进行完善, 同时增加群体情绪种类(害怕)以对研究假设 3 做更深入的分析。

实验 2 之选择以“利比亚事件”为背景蓝本, 是因为本研究计划实施时该事件刚刚发生不久, 是当时难得的可用来研究国人集体行动倾向的真实事件背景, 并且该事件本身相对不涉及被试自身的客观利益和本民族(内群体)利益, 从而与实验 1 背景事件的性质有所区别, 有助于对相关研究结果进行跨事件类型的检验。最为重要的是, 鉴于该事件的性质、中国一贯的对外政策和在事件之初的大众传播宣传策略, 使得该事件激发的社会认同(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有别于前述的基于国家或民族的一般性社会认同, 而是更贴近于 Simon 和 Klandermans (2001)所提出的政治化的集体认同(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这种建立在共同的不满和共同敌人或谴责对象基础上的特殊的社会认同,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可能发生在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下, 涉及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认同(或者说是第三方的认同), 如和平主义者争取各方力量来反对核武器, 巴以冲突的产

生和激化等。而在利比亚事件背景下,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其长久以来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非政策)以及在对内对外的宣传中, 都力图塑造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一直将帮助非洲经济落后国家发展, 维护非洲地区和平和安全作为自身的重要责任(李安山, 2006)。而在利比亚事件发生之初, 中方主流媒体的宣传也强调西方强国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和对平民的伤害, 并且还重点从经济角度突出利比亚紧张局势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 以及中国企业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这些都强化了中国人民对与利比亚人民的相似性和共同命运的感知(Brewer & Silver, 2000), 以及对西方联军的不满和谴责, 从而较易激发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这一更具包容性的特殊的社会认同。

#### 3.1 研究方法

##### 3.1.1 研究被试

研究 2 随机选取了天津市 6 所大学的本科生为研究被试, 共发放问卷 480 份, 收集有效问卷 473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8.54%。其中男生 190 人, 女生 275 人, 8 人性别未填。年龄跨度为 17 岁到 24 岁, 平均年龄 21 岁( $SD=1.18$  岁)。涉及化学、法学、计算机、工商管理 58 个专业。

进一步分析显示, 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被试在性别( $\chi^2 = 1.04, df=1, p=0.35$ )、学校( $\chi^2 = 1.12, df=5, p=0.95$ )上的人数比例无显著差异, 但在年级上的差异显著,  $\chi^2 = 11.77, df=3, p<0.05$ 。

##### 3.1.2 研究程序

具体研究程序类同实验 1。

##### 3.1.3 研究工具

为尽量弥合被试间的背景知识差异, 统一研究情境, 研究者首先从“利比亚事件”简介、各国官方反应、民间反应等方面, 搜集和整理了国内有关该事件的权威媒体报道, 根据事件进展汇编了一份 1000 字左右的新闻材料, 修改了其中具有态度偏

表 5 不同行动情境下的样本分布

情境	性别		年级				学校						总计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学校 1	学校 2	学校 3	学校 4	学校 5	学校 6	
现实	92	149	38	94	100	9	130	17	22	19	18	35	241
网络	98	134	37	80	89	26	131	16	23	13	17	32	232
合计	190	283	75	174	189	35	261	33	45	32	35	67	473

<sup>3</sup>注: 事件具体过程详见百度百科“利比亚事件”词条内容: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9964.htm>

向性或暗示性的言辞,尽量从中立角度对事件始末进行介绍,该部分材料放于调查问卷的第一部分呈现给研究被试。其次,在实验1的调查问卷基础上,对相关变量的测量指标进行完善,问卷题目包括以下几部分:

(1)社会认同:实验2涉及两个层次的社会认同: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利比亚认同),代表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其具体测量题目为:“利比亚和中国关系紧密,利比亚的危机以及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感到与利比亚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我感到与利比亚人民有着紧密的联系”。学校认同或网络认同,代表对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具体题目类同实验1。相关陈述均采用7点Likert式量表评定(从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7代表“非常同意”)。

(2)群体情绪:实验2测量了两类群体情绪:愤怒和害怕,每类情绪由3个情绪词语来表示(愤怒:生气、愤怒、反感;害怕:担心、害怕、焦虑)(Smith, Seger, et al., 2007; Van Zomeren et al., 2004; Yzerbyt et al., 2003),并让被试针对材料中反映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内政的军事干预,以及无辜利比亚平民遭受伤害的情形,根据自己的情绪感受对上述6个词语进行7点Likert式量表评定(从第1级“完全没有”至第7级“非常”)。

(3)效能感:效能感仍划分为两个层次:自我效能感和群体效能感。自我效能感的题目同实验一,其在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56和0.62。为使模型拟合更趋稳定,群体效能感的题目除涉及对参与行动人数的估计外,还包括对许多人参与时行动成功的可能性估计,其在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3和0.61。上述题目都采用7点Likert式量表评定。

(4)行动倾向:实验2中同样设置了两类集体行动情境,现实情境和网络情境下集体行动。现实集体行动形式为学生所在大学组织的集体游行活动(地点:大学校园内,时间:半天)。网络集体行动形式仍为人人网组织的集体实名签字抗议活动,签名信将寄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试对自己参与上述行动的可能性评估作为行动倾向的测量指标,采用7点量表评定(从1代表“完全不可能”至7代表“完全可能”)。

(5)事件态度:此外,研究者为了解被试对“利比亚事件”所持态度,调查问卷中穿插了对该事件的正反态度的调查,支持性的态度包括:“西方联军

的军事干预有助于恢复利比亚的社会秩序”,“帮助利比亚人民获得自由等机会”,“维护人类世界的公平和正义”等6道题目,其在现实和网络两种情境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2和0.93。反对的态度包括:“西方联军的军事干预威胁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违背了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干预他国内政,威胁他国主权安全”等7道题目,其在现实和网络两种情境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和0.91。同样采用7点Likert式量表对相关题目进行评定(从第1级“非常不同意”至第7级“非常同意”)。

问卷的最后还询问了被试的性别、年级和所在院系等人口学变量信息。

## 3.2 结果

### 3.2.1 被试的事件态度分析

结果显示(表6和表7),不管是在现实情境( $M_{\text{同}}=2.33, SD_{\text{同}}=1.09; M_{\text{反}}=5.55, SD_{\text{反}}=1.05$ )还是在网络情境下( $M_{\text{同}}=2.18, SD_{\text{同}}=1.10; M_{\text{反}}=5.67, SD_{\text{反}}=1.03$ ),人们对西方联军的做法主要持反对态度,反映了其与国内当时主流媒体宣传口径的一致性,同时也为随后的分析提供了一定参考。

### 3.2.2 各变量在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初步分析

对现实情境的初步分析发现,除在愤怒和害怕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外( $M_{\text{男生愤怒}}=4.10, M_{\text{女生愤怒}}=4.54, p<0.05; M_{\text{男生害怕}}=2.31, M_{\text{女生害怕}}=2.78, p<0.01$ ),其它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t_{\text{利比亚认同}}(233)=-1.60, p=0.11; t_{\text{学校认同}}(232)=-1.10, p=0.27; t_{\text{自我效能}}(236)=-0.38, p=0.70; t_{\text{集体效能}}(235)=-1.39, p=0.14; t_{\text{行动倾向}}(236)=0.47, p=0.64$ )。

对网络情境的初步分析发现,除在愤怒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外( $M_{\text{男生愤怒}}=3.84, M_{\text{女生愤怒}}=4.38, p<0.05$ ),其他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t_{\text{利比亚认同}}(227)=-0.78, p=0.44; t_{\text{网络认同}}(227)=-1.29, p=0.20; t_{\text{害怕}}(225)=-1.76, p=0.08; t_{\text{自我效能}}(227)=1.02, p=0.31; t_{\text{集体效能}}(228)=-0.08, p=0.93; t_{\text{行动倾向}}(228)=0.66, p=0.51$ )。

### 3.2.3 社会认同、情绪和效能感对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路径模型建构

为与实验一中的结果进行对比,本研究中的模型设定、分析程序与实验一基本一致。具体结果见表6、图3和图4。

由表8可知,假设模型在两种情境下的拟合都较为理想,网络情境拟合更好。 $M_2$ 与 $M_1$ 相比, $\chi^2$ 增加不显著( $\Delta\chi^2=13.40, \Delta df=18, p>0.05$ ),说明国家认同、愤怒、害怕、自我效能、群体效能和行动

倾向的测量指标在两种情境下具有一定的恒等性, 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均值比较和路径系数分析。在  $M_3$  中, 同样将现实情境中的各潜在变量的均值设为 0, 网络情境下各潜在变量的均值自由估计; 与  $M_2$  相比, 拟合变差,  $\Delta\chi^2 = 74.66$ ,  $\Delta df = 10$ ,  $p < 0.01$ 。具体分析发现, 网络情境中的群体效能均值显著高于现实情境中的群体效能均值 ( $M_{网络} = 3.67$ ,  $t = 2.80$ ), 其他潜变量均值无显著差异。

由图 3 和图 4 可知, 现实情境下, 愤怒和自我效能感对行动倾向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 与利比亚

人民的认同对愤怒、害怕、群体效能和自我效能都有显著影响, 对学校的认同只对两种效能感有显著影响。网络情境下, 只有自我效能对行动倾向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 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对两种情绪和效能的影响都显著, 对学校的认同只对自我效能的影响显著。整合模型对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倾向的解释率都为 45%。

与实验一相似,  $M_4$  的拟合结果显示(与  $M_2$  相比,  $\Delta\chi^2 = 25.99$ ,  $\Delta df = 14$ ,  $0.01 < p < 0.05$ ), 各因素的影响路径和影响程度具有一定的跨情境恒等性。

表 6 现实情境下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及各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n_1 = 241$ )

$M (SD)$	利比亚认同	学校认同	愤怒	害怕	群体效能	自我效能	行动倾向
利比亚认同	3.95 (1.08)						
学校认同	0.05	5.44 (1.27)					
愤怒	0.37**	0.1	4.38 (1.51)				
害怕	0.44**	0.05	0.40**	2.61 (1.32)			
群体效能	0.35**	0.31**	0.35**	0.30**	4.08 (1.10)		
自我效能	0.24**	0.24**	0.17*	0.12	0.41**	4.27 (1.20)	
行动倾向	0.30**	0.14*	0.32**	0.20**	0.49**	0.50**	3.82 (1.65)

表 7 网络情境下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及各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n_2 = 232$ )

$M (SD)$	利比亚认同	网络认同	愤怒	害怕	群体效能	自我效能	行动倾向
利比亚认同	3.85 (1.07)						
网络认同	0.37**	3.67 (1.02)					
愤怒	0.36**	0.16*	4.15 (1.63)				
害怕	0.40**	0.22**	0.43**	2.67 (1.38)			
群体效能	0.40**	0.31**	0.30**	0.22**	4.33 (1.04)		
自我效能	0.40**	0.38**	0.26**	0.22**	0.54**	4.06 (1.30)	
行动倾向	0.36**	0.26**	0.30**	0.14*	0.45**	0.49**	4.41 (1.66)

表 8 多组比较分析中各模型的拟合指数

模型	$\chi^2$	$df$	$\chi^2/df$	RMSEA	NFI	NNFI	CFI	IFI	GFI
$M_{现实}$	189.80	103	1.84	0.06	0.92	0.95	0.96	0.96	0.91
$M_{网络}$	162.05	103	1.57	0.05	0.94	0.97	0.98	0.98	0.92
$M_1$	351.85	206	1.71	0.06	0.93	0.96	0.97	0.97	0.91
$M_2$	365.25	224	1.63	0.05	0.93	0.96	0.97	0.97	0.92
$M_3$	439.91	234	1.88	0.06	0.91	0.95	0.96	0.96	0.91
$M_4$	391.24	238	1.64	0.05	0.92	0.97	0.97	0.97	0.91

注:  $M_{现实}$  为假设模型在现实情境下的单独分析

$M_{网络}$  为假设模型在网络情境下的单独分析

$M_1$  为假设模型在两种情境下的同时分析, 但不设限制

$M_2$  在  $M_1$  的基础上设定国家认同、愤怒、害怕、自我效能、群体效能和行动倾向等潜在变量与其测量指标间的因子负荷以及上述潜变量的方差和协方差在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相等同

$M_3$  在  $M_2$  基础上设定指标截距等同, 比较潜在因子的平均数在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差异

$M_4$  在  $M_2$  基础上设定各路径系数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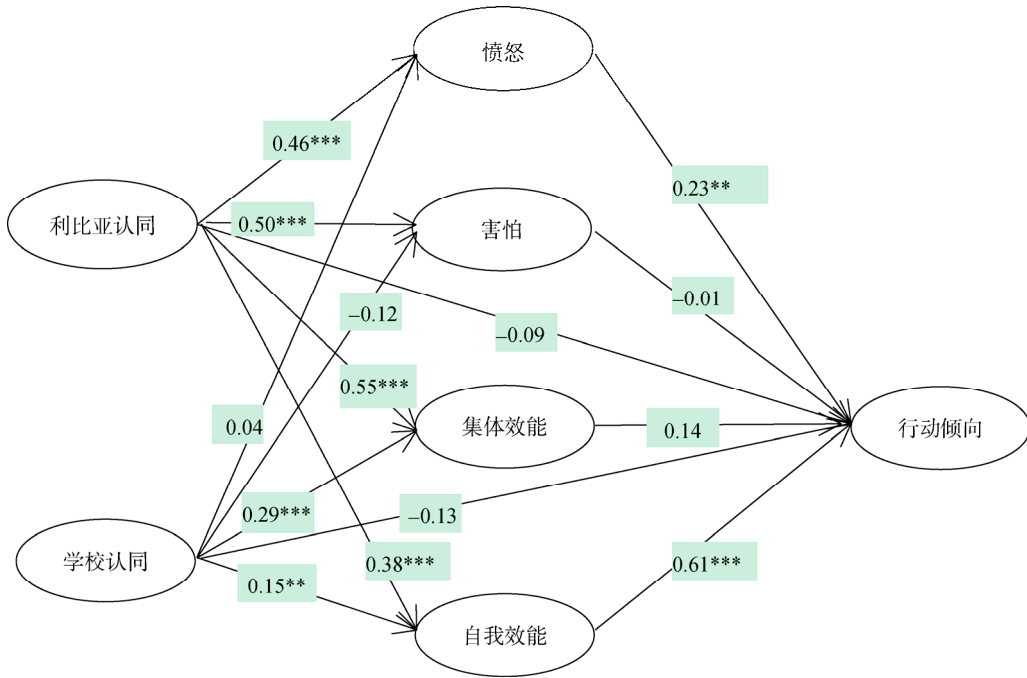


图 3 现实情境下的集体行动参与整合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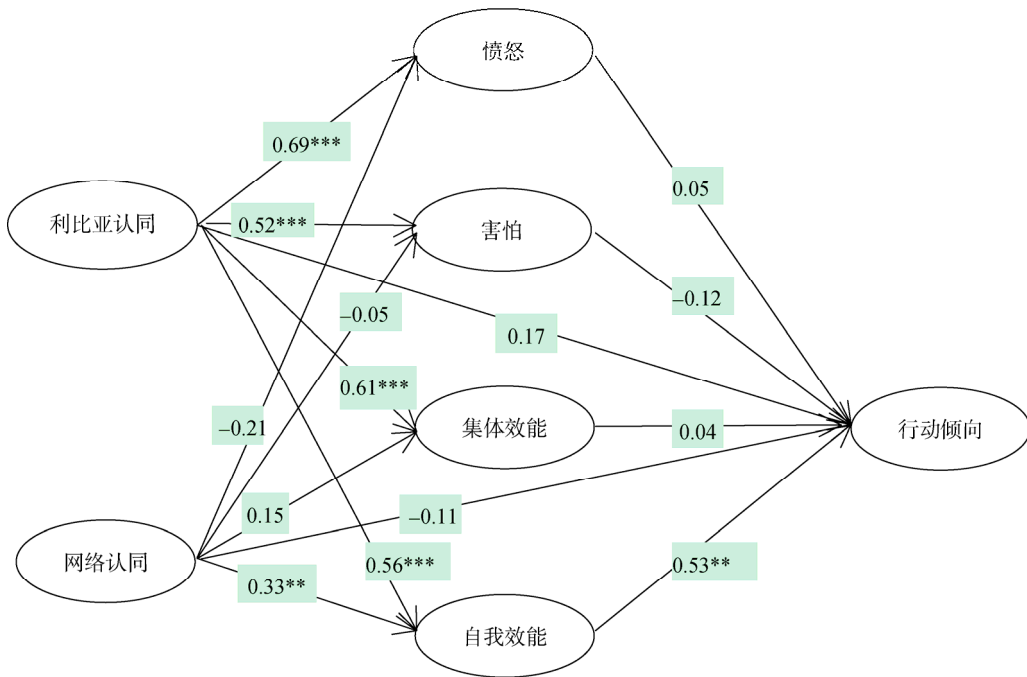


图 4 网络情境下的集体行动参与整合模型

### 3.3 讨论

实验 2 以不涉及被试自身直接利益和本民族利益的“利比亚事件”为背景蓝本，社会认同中的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不同于实验 1 中采用的国家认同，属于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认同（利比亚认同），并且增加了情绪种类，对测量题目

进行了改进，进而检验实验 1 发现的有关多元社会认同、效能感，以及情绪在影响人们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参与时的特征是否具有跨事件情境的稳定性。

结果发现，实验 1 中的假设模型在实验 2 的事件背景下仍具有较好拟合性，但同样在具体路径中，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假设 1 得到了部分验证, 充分说明了社会认同在集体行动中的基础性作用。集体行动整合模型可分别解释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倾向的 45% 的变异量。情绪路径中, 愤怒只有在现实情境下对集体行动参与倾向有显著影响力, 假设 3 得到部分验证。效能路径中, 自我效能两种情境下对集体行动参与倾向皆有显著影响, 但结合实验 1, 并非发现两种效能感影响集体行动参与的系统性规律。研究假设 4 并未得到验证, 这究竟归因于假设本身, 还是由于事件类型或测量方法的影响所致,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检验和说明。但综合两条路径对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的影响, 却再次证明了网络集体行动决策更趋理性的假设(假设 5)。

实验 2 中的两种行动情境下, 两个层次的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参与影响程度皆不存在显著差异, 并且两者对人们的集体行动参与倾向皆无显著直接影响。但从影响路径(或其与情绪和效能感的关系)来看, 则再次验证了实验 1 的重要发现: 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 主要通过情绪或效能路径显著影响人们的集体行动参与决策; 而与集体行动组织方的社会认同, 则主要通过效能路径显著影响人们的行动倾向。该结果验证并发展了研究假设 2, 即扩展了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的影响路径, 但对于多元认同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具体因果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

#### 4 实验三: 多元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参与作用因果机制的启动实验

实验 1 和实验 2 虽然证实了社会认同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基础性地位, 验证并发展了多元认同对集体行动参与的作用路径假设, 但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技术, 并不能严格意义地完全揭示变量间的具体因果机制, 以往研究对此也涉猎甚少。并且, 实验 1 和实验 2 都是以行动倾向作为最终因变量, 并未考量到人们的实际行动。因此, 为明确多元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因果影响机制, 实验 3 以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以及研究被试所在大学组织的“反对就业歧视、保障平等权利”主题宣传活动为背景蓝本, 将现实集体行动参与倾向以及实际行动作为因变量, 通过实验法检视前述研究中发现的不同层次社会认同与情绪路径、效能路径间的因果关系, 从而清晰勾勒出多元社会认同的作用。

实验 3 采用 Kawakami, Young 和 Dovidio (2002) 探究社会类别特征对自动化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时, 所使用的社会类别内隐启动和检验范式。以往有关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参与影响机制的实验研究, 大多是通过向被试提供特定的群际事件背景信息(Smith, Terry, & Hogg, 2007; Van Zomeren et al., 2004), 或让被试想象或回忆自己或他人作为某弱势群体成员的遭遇(Simon et al., 1998; Van Zomeren, Spears, et al., 2008), 抑或让被试思考与某一群体成员的相似性等方式(Glasford, Dovidio, & Pratto, 2009; McLeish & Oxoby, 2011; Yopyk & Prentice, 2005), 来启动个体对某一特定群体的认同感, 并通过问卷对启动效果进行检验, 这种外显的启动和检验方式很容易让被试觉察到实验的真正意图, 从而导致各种实验偏差。另一方面, 以往很多研究发现通过呈现图片、音乐和词语等内隐刺激方式, 启动特定群体成员身份的有效性(Banaji & Greenwald, 1995; Banaji, Hardin, & Rothman, 1993; Macrae, Milne, & Bodenhausen, 1994); 甚至有研究发现, 对目标群体成员来说, 内隐启动比外显启动的效果更佳(Shih, Ambady, Richeson, Fujita, & Gray, 2002)。Kawakami 等(2002)的研究就是通过图片判断任务, 启动被试有关老年人的类别表征, 并在检验方法上有所创新。他们采用更加隐蔽的词语判断任务来检验类别启动的效果, 提高了实验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 4.1 研究方法

###### 4.1.1 研究被试

鉴于实验 3 所选事件背景的特点(主要针对大学女生在就业面试中所面临的性别歧视问题), 以及实验 1 和实验 2 中, 不同性别被试在主要自变量、因变量上基本无显著差异的结果, 实验 3 选取了某大学的 135 名女生为被试, 其中大二学生 50 名, 大三学生 85 名; 理工科学生 34 名, 文科学生 101 名。她们被随机分配到 3 种实验处理组中: 女性认同组( $n_1=45$ )、学校认同组( $n_2=44$ )和控制组( $n_3=46$ )。进一步分析显示, 三组被试在年级( $\chi^2=4.01, df=2, p=0.13$ )、专业( $\chi^2=0.62, df=2, p=0.73$ )上的人数比例皆无显著差异。

###### 4.1.2 实验设计

实验 3 的实验中采用图片识别任务启动被试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实验为 3 个处理水平的被试间设计: 女性认同组、学校认同组和控制组。女性认同组期望启动被试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

类别认同;学校认同组期望启动被试对集体行动组织方的社会认同;控制组为基线水平,不启动被试任何层次或类别的社会认同。为控制性别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所以三组被试皆为女生。

研究最后,通过词语判断任务检验不同认同的启动效果,该任务为被试内设计:与女性有关的正确词语、与男性有关的错误词语、与所在学校有关的正确词语、与其它学校有关的错误词语、常用正确词语和常用错误词语。研究者假设,女性认同组被试对女性有关的正确词语的反应时,应该快于对常用正确词语的反应时;学校认同组和控制组被试对女性有关的正确词语的反应时,则应慢于常用正确词语的反应时,或与之无显著差异。鉴于与学校相关的词语的日常使用率较低,因此通过对比3个实验处理组对学校有关的正确词语的反应时的方式,来检验学校认同的启动后效。

三组被试的图片识别任务和词语判断任务都在电脑上进行,使用 E-Prime 软件进行呈现和自动记录。在两个任务中穿插纸质问卷调查环节,测量被试对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的情绪反应,以及对学校组织的在校外开展的面向普通市民的“对就业歧视、保障平等权利”主题宣传活动的参与意愿、效能感和实际报名情况。

#### 4.1.3 研究材料

(1) 图片识别任务中的材料:女性认同组中的正式实验材料为40张中性表情的正面人物头像的黑白照片(白露,马慧,黄宇霞,罗跃嘉,2005),包括20张女性照片和20张男性照片。练习材料为正式实验中未出现的8张中性表情的正面人物头像的黑白照片,包括4张男性照片和4张女性照片。学校认同组中的正式实验材料为40张景物图片,包括20张被试所在某大学的代表性景物图片和20张其它学校的代表性景物图片。练习材料为正式实验中未出现的8张景物图片,包括4张被试所在某大学的代表性景物和4张某城市的代表性景物。控制组中的正式实验材料为40张食物类图片,包括20张水果图片和20张蔬菜图片,练习材料为正式实验中未出现的8张食物类图片,包括4张水果图片和4张蔬菜图片。

每组被试先仔细阅读电脑屏幕上的指导语并进行几次练习,如没有疑问就进入正式的实验阶段。女性认同启动组的任务是让被试判断呈现的人物图片是否为女性,在每张图片呈现之后,屏幕中央都会出现一个“女性?”的问题以增强启动效果。

如果图片中的人物是女性,就按键盘上的“9”键,如果不是女性就按“0”键,按键结束后就会呈现下张图片。主试要求被试尽可能既快又准地进行判断。练习时有回答正确与否以及反应时的反馈信息,但正式实验时,无此信息。学校认同启动组和控制组的任务与女性认同启动组的任务相似,只是将判断目标和问题字样改为“××大学?”或“水果?”。

(2) 词语判断任务:该部分共包括6种不同的词语类型,3种正确词序的词语(例如,时间、资料、东西)用来检验启动操作,3种错误词序的词语(例如,间空、术技、筑建)用来掩盖真实的实验目的。正式实验部分给被试呈现48个词语,包括8个与女性有关的词序正确的词语(例如,手镯、裙子、娃娃、护士、化妆品、空姐、女生、主妇)、8个与男性有关的词序错误的词语(例如,包公文、装西、员飞行、烟香、子胡、车吉普、板老、生男)、8个与被试所在学校有关的词序正确的词语(例如,陈省身、张伯苓、严范孙、允公允能、日新月异、龚克、大中路、南开大学)、8个与其它学校有关的词序错误的词语(例如,森钱学、禹曹、钊李大、大天、大学北京、大浙、池清华、师大天津)、8个常用且词序正确的词语(例如,工业、儿童、人口、传统、道路、树木、茶叶、理论)和8个常用且词序错误的词语(例如,器电、园公、地土、物动、话电、影电、院医、视电)。

其中与性别有关的词语主要摘自 Blair 和 Banaji (1996)实验中的非人格特质类的词语材料,该研究的重要成果就是建立了一套具有代表性的性别启动材料,并且验证了相对于人格特质类的词语,非人格特质类的词语与性别相关的社会群体联系更紧密的结论(Brewer, 1988)。而常用词语则摘自《现代汉语词频统计》前1000个与前述性别和学校无关的词语。各类词语都按字数长短进行了匹配。

(3) 问卷部分:首先,以中立、客观的文字和图表介绍麦可思研究院(2011)对中国2010届不同性别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报告的主要结果(在几项重要就业指标上,女生明显低于男生),随后测量被试的情绪反应(愤怒和害怕)。再对被试所在大学去年在校外开展的面向普通市民的“反对就业歧视、保障平等权利”主题宣传活动(真实活动)和今年的活动计划做简要说明,以征询大家的意见为表面目的,测量被试的活动参与意愿和相关的群体效能和自我效能感,具体题目类同实验2(同样采用7点 Likert 量表式测量)。最后填写被试的专业、年级等

人口学背景信息。对于真正想志愿报名参加的被试,可留下自己的电话、邮箱,并说明闲暇时间,以此作为被试的实际行动指标。

## 4.2 结果

### 4.2.1 对数据的筛选

根据以往对反应时实验数据处理的经验(Kawakami et al., 2002; Ratcliff, 1993),在进行正式分析前,需要对数据进行筛选,剔除词语判断任务中判断错误的反应时数据(7.43%),再排除掉平均值上下3个标准差的反应时数据(1.60%)。

### 4.2.2 对实验操作的检验

首先,为检验女性认同组是否启动了被试的女性认同,分别在两个实验处理组和控制组内做以反应时为因变量、以词语类型(仅考虑与女性有关的正确词语、与学校有关的正确词语和常用正确词语)为自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女性认同组内词语类型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2, 380) = 2.82, p = 0.06$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与女性有关的正确词语的反应时( $M = 792.18, SD = 291.32$ )快于对与学校有关的正确词语( $M = 876.55, SD = 298.86$ )和常用正确词语( $M = 815.10, SD = 276.96$ )的反应时,前者达到显著水平( $p < 0.05$ ),后者未达到显著水平( $p = 0.52$ )。学校认同组内词语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2, 378) = 3.38, p < 0.05$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与女性有关的正确词语的反应时( $M = 711.92, SD = 234.49$ )快于对与学校有关的正确词语的反应时( $M = 758.03, SD = 261.94$ ),慢于对常用正确词语( $M = 683.32, SD = 178.28$ )的反应时,但都未达到显著水平。控制组内词语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2, 326) = 11.02, p < 0.00$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与女性有关的正确词语的反应时( $M = 758.25, SD = 218.67$ )显著快于对与学校有关的正确词语( $M = 897.28, SD = 319.44$ )的反应时( $p < 0.00$ ),慢于对常用正确词语( $M = 749.34, SD = 233.08$ )的反应时,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p = 0.80$ )。该结果显示,观看和判断与性别有关的图片确实提高了被试对与女性有关词语的反应时(即使在中间穿插了问卷调查环节),表明了该组被试的女性认同被成功启动。

其次,由于与学校有关的词语相对于与女性有关的词语和常用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较低,因此为检验学校认同组的启动效果,做以对学校有关的正确词语的反应时为因变量,以实验处理为自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处理的主效应显

著, $F(2, 345) = 7.62, p < 0.00$ ,进一步分析发现,学校认同组被试对与学校有关的正确词语的平均反应时,要显著快于女性认同组( $p < 0.00$ )和控制组( $p < 0.05$ )被试对与学校有关的正确词语的反应时。该结果显示,观看和判断与学校有关的图片确实相对提高了被试对与学校有关词语的反应时(即使在中间穿插了问卷调查环节),表明了该组被试的学校认同被成功启动。

### 4.2.3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机制分析

研究者以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多组比较法来代替传统的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社会认同启动情况下,各变量的均值差异以及情绪和效能感对行动倾向的路径系数特征。

由表12、图5~图7可见,由于受小样本的影响,一些拟合指数和路径系数出现了不恰当解,但其它与违规参数无关的参数估计值和拟合指数仍具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嵌套模型比较而言(侯杰泰等,2004)。因此,总体来看,假设模型在3种实验处理下的单独分析和共同分析都可接受,并且相对于不设任何限制的 $M_1, M_2$ 的 $\chi^2$ 增加不显著( $\Delta\chi^2 = 41.51, \Delta df = 46, p > 0.05$ ),说明测量工具在不同的实验处理间具有一定的恒等性。在 $M_3$ 的均值比较中,除女性认同启动组中的群体效能感显著低于控制组外,其他变量与控制组相比均无显著差异。而由 $M_4$ 和 $M_2$ 的比较可知( $\Delta\chi^2 = 33.65, \Delta df = 20, p < 0.01$ ),路径系数在不同的实验处理中可能存在着差异,具体分析可知(如图5~图7所示),相对于控制组中都不显著的路径系数,女性认同启动组中,愤怒和群体效能对行动倾向有显著影响,学校认同启动组中,群体效能对行动倾向的影响显著,该结果反映了不同层次社会认同对情绪和效能确实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

### 4.2.4 社会认同对实际行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由于实际行动为二分变量,因此采用 Logistic 回归。检验不同认同启动下,情绪和效能对人们真实行为的影响规律。

由表13~表15可知,不同实验处理组中,对实际行动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不相同。在女性认同启动组中,愤怒和群体效能对实际行动有显著预测作用;在学校启动组中,自我效能的作用显著;在控制组中,各因素的作用都不显著。该结果再次会说明不同层次社会认同对情绪和效能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

表 9 女性认同启动下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n_1=45$ )

<i>M</i> ( <i>SD</i> )	愤怒	害怕	群体效能	自我效能	行动倾向
愤怒	3.00 (1.53)				
害怕	0.59**	2.42 (1.26)			
群体效能	0.13	0.14	4.43 (0.95)		
自我效能	0.08	-0.24	0.37*	5.08 (1.20)	
行动倾向	0.26	0.00	0.49**	0.39**	5.24 (1.52)

表 10 学校认同启动下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n_2=44$ )

<i>M</i> ( <i>SD</i> )	愤怒	害怕	群体效能	自我效能	行动倾向
愤怒	2.93 (1.48)				
害怕	0.34*	2.21 (1.14)			
群体效能	0.03	-0.17	4.70 (0.84)		
自我效能	0.05	-0.19	0.37*	4.99 (1.08)	
行动倾向	-0.09	-0.05	0.36*	0.38*	5.76 (1.12)

表 11 控制组中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 $n_3=46$ )

<i>M</i> ( <i>SD</i> )	愤怒	害怕	群体效能	自我效能	行动倾向
愤怒	2.83 (1.56)				
害怕	0.38*	2.36 (1.37)			
群体效能	0.03	-0.12	4.89 (0.76)		
自我效能	-0.01	0.26	0.28	5.01 (1.07)	
行动倾向	-0.09	0.16	0.32*	0.64**	6.00 (1.01)

表 12 多组比较分析中各模型的拟合指数

模型	$\chi^2$	<i>df</i>	$\chi^2/df$	RMSEA	NFI	NNFI	CFI	IFI	GFI
$M_{\text{女性}}$	40.91	39	1.05	0.03	0.84	0.95	0.96	0.96	0.85
$M_{\text{学校}}$	26.17	39	0.67	0.00	0.87	1	1	1	0.90
$M_{\text{控制}}$	29.31	39	0.75	0.00	0.89	1	1	1	0.89
$M_1$	96.39	117	0.82	0.00	0.86	1	1	1	0.89
$M_2$	137.90	163	0.84	0.00	0.81	1	1	1	0.85
$M_3$	149.00	175	0.85	0.00	0.79	1	1	1	0.85
$M_4$	171.55	183	0.93	0.00	0.77	0.99	0.99	0.99	0.81

注： $M_{\text{女性}}$ 为假设模型在女性认同启动下的单独分析

$M_{\text{网络}}$ 为假设模型在学校认同启动下的单独分析

$M_{\text{控制}}$ 为假设模型在控制组中的单独分析

$M_1$ 为假设模型在两种情境下的同时分析，但不设限制

$M_2$ 在  $M_1$  的基础上设定各潜在变量的方差和协方差，因子负荷和测量误差在三种实验处理中相等同

$M_3$ 在  $M_2$  基础上设定指标截距等同，比较潜在因子的平均数在三种实验处理中的差异

$M_4$ 在  $M_2$  基础上设定各路径系数等同

### 4.3 讨论

实验三以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和研究对象所在大学组织的“反对就业歧视、保障平等权利”主题宣传活动为背景，在前两项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验设计进一步剖析多元社会认同与

情绪路径和效能路径的具体关系和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因果影响机制。

结果发现，除群体效能的均值在女性认同组和控制组间有显著差异外，其它因素(特别是情绪)的均值在不同的实验处理下并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



由于所选背景事件既与群体利益有关, 也与个人切身利益相关, 因此, 不管是从群体层面还是从个体层面考虑, 都会激发个体的愤怒和害怕情绪, 另一方面, 结合前述两个研究中的均值差异不显著结果, 可以推测效能和情绪可能并非作为社会认同和集体行动间的中介变量。而从多组结构方程比较和多组 Logistic 回归的分析结果可知, 相对于控制组, 两种社会认同对情绪和效能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女性认同代表着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 同时调节着情绪(主要是愤怒)和效能感(主要是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 学校认同所代表的对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 则只调节着效能感(主要是自我效能)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 上述结果既是对研究假设 1、3 的验证, 更是对研究假设 2 的进一步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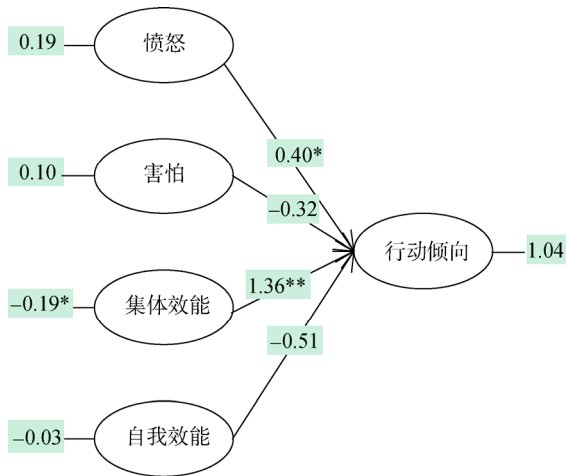


图 5 女性认同启动组中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以及各潜变量相对于控制组的标准化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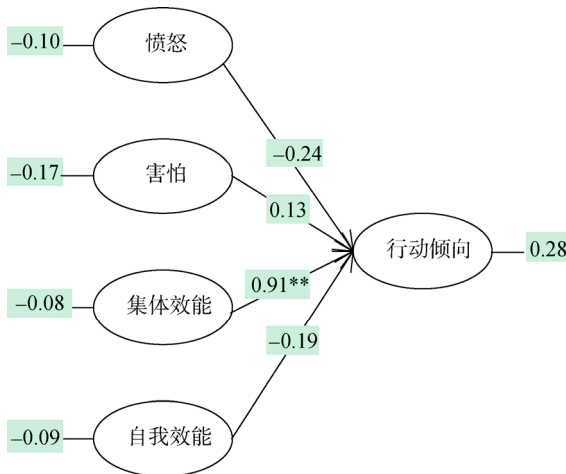


图 6 学校认同启动组中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以及各潜变量相对于控制组的标准化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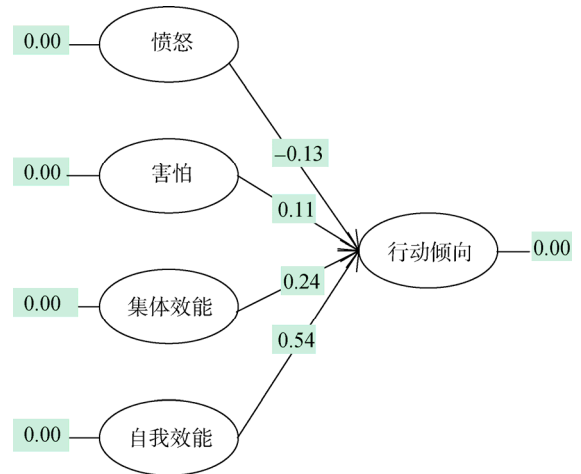


图 7 控制组中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以及各潜变量相对于控制组的标准化均值

表 13 女性认同启动下的回归系数( $n_1=45$ )

变量	B	S.E.	Wald	Exp (B)
愤怒	0.81	0.37	4.77*	0.45
害怕	-0.80	0.50	2.58	2.21
群体效能	1.33	0.61	4.77*	0.26
自我效能	0.24	0.38	0.40	0.79

表 14 学校认同启动下的回归系数( $n_2=44$ )

变量	B	S.E.	Wald	Exp (B)
愤怒	0.53	0.28	3.56	0.59
害怕	-0.01	0.33	0.00	1.01
群体效能	0.19	0.47	0.16	0.83
自我效能	1.14	0.48	5.55*	0.32

表 15 控制组中的回归系数( $n_3=46$ )

变量	B	S.E.	Wald	Exp (B)
愤怒	0.04	0.23	0.03	0.96
害怕	0.11	0.29	0.15	0.89
群体效能	0.73	0.48	2.31	0.48
自我效能	0.42	0.34	1.54	0.65

## 5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三项逐步递进的实验对 5 个研究假设进行了一一检验,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不同层次或类型的社会认同(多元社会认同)、群体情绪和效能感, 对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规律及相互关系。这既是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扩展和深入, 同时也能对我国社会管理实务工作提供一定理论参考。特别是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都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 容易爆发各种社会与经

济危机事件,不断触发着社会集体行动的产生。与此同时,互联网络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使得集体行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更具隐蔽性、突发性和扩散性。由于相关研究的匮乏,社会管理决策者往往不能及时地发现并化解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本研究结果不但可以为决策者引控和管理集体行动提供理论依据,并可以应用于大型活动、社会动员、危机管理和政府决策等领域,为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经济增长,提升全社会的突发应急能力提供理论基础。

具体来看,三项实验中的整合模型共同验证了社会认同在集体行动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实验 1 和实验 2 的具体路径分析中,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直接影响并非都显著,即不同层次社会认同主要通过群体情绪和效能感对集体行动倾向或行动产生间接影响,由此使得假设 1 得到部分验证,而直接作用上与以往研究的差异,是否是受行动场域和背景事件的影响,还有待未来研究检验。

除实验 1 中的现实情境外,本研究整体上并未发现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在直接影响集体行动参与倾向程度上的差异,表明以往基于西方背景下的研究结论并不具有普适性,那种影响程度上的差异,反映的可能只是不同的认同在其所提供的态度和行为规范明确性上的差异,而没有揭示出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而以往有关社会认同机制探索上的差异和矛盾,则可能归于所选变量及其维度、背景事件、行动类型和研究方法等的影响(Kelly & Breinlinger, 1995; Van Zomeren, Spears, et al., 2008)。为克服以往研究的局限,本研究通过基于不同事件背景、不同行动场域和不同方法的分析,验证和完善了假设 2,并进一步明确了多元社会认同影响集体行动参与的内在因果机制,获得了整项研究最为重要的发现:对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社会类别的认同,主要调节情绪或效能感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表现出感性兼具理性的内驱力特征;而对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则只调节效能感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表现出理性内驱力特征。换言之,那些使内群体利益受损的事件,激发了有群体认同感的成员对其群体所处状态的不公性和不稳定性感知和评价,萌生了采取行动的潜在动机,从而使其成为集体行动的潜在动员对象。其中,从属于特定组织的成员,其参与组织所动员的集体行动的意向和实际行动,除受一般性群体认同的影响外,还受到其对所属组织的态度和行为规范的內化程

度、以及其对组织行动资源和自身行动力考量的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发现从作用性质的角度,对集体行动研究中的多元认同问题进行了拓展,并对解决以往有关社会认同、情绪和效能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本研究所涉及的两类情绪中,只有愤怒在部分情境下(实验 2 的现实集体行动情境,与实验 3 的女性认同启动组情境)对集体行动参与有显著直接影响。而从路径分析和实验结果中都可看出,这种情绪并非是一种个人情绪,而是一种基于社会认同的群体情绪。正如 Seger, Smith 和 Mackie (2009)总结的,只要人们的社会认同被激活,不管使用什么测量方法,人们此时的情绪反应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群体的,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 3 和以往的研究结论(Dumont et al., 2003; Mackie & Smith, 2004; Smith, 1993; Van Zomeren et al., 2004),同时也反映出行动场域和事件类型对集体行动的潜在影响。

从整体的角度看,三项实验的系统性结果之一就是发现效能感对集体行动参与,具有跨事件背景和跨情境的显著影响,这验证了以往有关效能感重要性的研究结论(Folger, 1987; Klandermans, 1997; Martin, Brickman, & Murray, 1984)。但从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前两项实验中,集体效能只在实验 1 的网络情境下对集体行动参与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自我效能则在除此之外的三种情境下都对集体行动参与有显著的作用。该结果表明了两种效能感对集体行动影响机制上的潜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研究假设 4,同时也反应出人们在进行集体行动决策时更偏重对个体行动力的考虑。Brunsting 和 Postmes (2002)对现实和网络中“软、硬”两类集体行动研究时就曾发现,自我效能在所有的行动情境下都是最主要的预测变量,而集体效能对硬行动(hard action)的预测能力就较弱,并且与软行动(soft action)参与无显著相关。但这种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未来整合性研究的检验(Brunsting & Postmes, 2002)。

此外,三项实验中情绪和效能感对现实集体行动参与的共同影响,以及实验 1 和实验 2 中效能感对网络集体行动的独特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有关网络情境中的行为决策更为理性的假设(研究假设 5),可能正是网络的匿名环境更易促进群体认同凸显,使个体的行动决策更多地受到对他人行动和自身贡献力的考量(Giguère & Lalonde, 2010; Reicher & Levine, 1994; Reicher et al., 1995)。

## 6 局限和展望

首先, 本研究主要以天津市大学生为主要调查和实验被试, 虽然被试各自生源地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 但不排除已受天津当地文化的影响, 并且针对学生参与校园集体行动的研究结果, 可能难以扩展到能够全面解释中国当下社会各类备受关注的集体行动, 因此, 研究者将来需要针对不同集体行动参与人群以及不同性质的集体行动继续开展研究。

其次, 实验 3 只涉及现实情境下的集体行动, 虽然对行动倾向、实际行为的分析一致地反映出多元社会认同的影响机制, 但由于现实和网络情境下的集体行动特征和规律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仍需要网络集体行动的实验研究, 对本研究的重要结论进行重复检验。

最后, 本研究重点考察了多元社会认同、情绪和效能感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以及多元社会认同的作用机制, 因此假设模型以及实验分析中并未涉及情绪和效能感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目前对两者间的关系也仍未形成统一定论, 虽然 Mummendey 等 (1999) 和 Van Zomeren 等 (2004) 的研究都指出, 情绪和效能感在影响集体行动时是两条彼此补充但独立的路径, 但 Van Zomeren 等 (2004) 随后也指出, 对工具性支持的感知(行动支持)可强化情绪支持感知(社会观点支持), 但情绪支持感知并不必然增强工具性支持感知。而另有研究发现群体效能虽然能导致愤怒的情绪体验, 但不存在调节群体性不利对成员感受的影响, 也就是说群体效能更可能独立于情绪而对集体行动参与产生作用 (Smith, Cronin, & Kessler, 2008)。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通过设立竞争模型或实验设计等方式, 深入探索情绪和效能感在影响集体行动参与时的相互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Ajzen, L., & Fishbein, M. (1977).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4, 888-918.
- Bai, L., Ma, H., Huang, Y. X., & Luo, Y. J.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native 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A pretest in 46 college students.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19, 719-722.
- [白露, 马慧, 黄宇霞, 罗跃嘉. (2005). 中国情绪图片系统的编制: 在 46 名中国大学生中的试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 719-722.]
- Banaji, M. R., & Greenwald, A. G. (1995).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ing in judgments of fa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181-198.
- Banaji, M. R., Hardin, C., & Rothman, A. J. (1993). Implicit stereotyping in person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2), 272-281.
-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Freeman.
- Berman, S. L., & Wittig, M. A. (2004). An intergroup theories approach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African-Americans.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7(1), 19-34.
- Blair, I. V., & Banaji, M. R. (1996).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processes in stereotype prim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142-1163.
- Brewer, M. B. (1988). A dual process model of impression formation. In T. K. Srull & R. S. Wyer, Jr. (Eds.), *Advances in social cognition* (Vol. 1, pp. 1-36).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Brewer, M. B., & Silver, M. D. (2000). Group distinctiveness,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collective mobilization. In S. Stryker, T. J. Owens, & R. W. White. (Eds.), *Self,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Vol. 13, pp. 153-17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runsting, S., & Postmes, T. (2002).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Small Group Research*, 33, 525-554.
- Chen, H., Xue, T., & Yue, G. A. (2012). Instrumentality, social identity, and group-based anger: Overview of collective action research.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127-136.
- [陈浩, 薛婷, 乐国安. (2012). 工具理性、社会认同与群体愤怒: 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0, 127-136.]
- Dumont, M., Yzerbyt, V., Wigboldus, D., & Gordijn, E. H. (2003).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fear reactions to the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1509-1520.
- Feng, S. Z. (2003). On the western social movement: Status quo and paradigms. *Social Sciences Abroad*, (5), 66-70.
- [冯仕政. (2003).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 现状与范式. *国外社会科学*, (5), 66-70.]
- Folger, R. (1987). Reformulating the preconditions of resentment: A referent cognitions model. In J. C. Masters & W. P. Smith (Ed.), *Social comparison, social justice,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pp. 183-215). London: Erlbaum.
- Fox, D., & Schofield, J. W. (1989). Issue salience, perceived efficacy and perceived risk: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anti-nuclear war activit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 805-827.
- Giguère, B., & Lalonde, R. N. (2010). Why do students strike? Direct and indirect determina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31, 227-247.
- Glasford, D. E., Dovidio, J. F., & Pratto, F. (2009). I continue to feel so good about us: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the use of social identity-enhancing strategies to reduce intragroup dissona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5, 415-427.
- Gordijn, E. H., Wigboldus, D., & Yzerbyt, V. (2001). 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categorizing victims of negative outgroup behavior as ingroup or outgroup.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4, 317-326.
- Greene, S. (2004).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5, 136-153.
- Hong, Y., Liao, H., Chan, G., Wong, R., Chiu, C., Ip, G. W., et al. (2006). Temporal causal links between outgroup attitudes and 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 case of Hong Kong 1997

- Transition.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9, 265–288.
- Hou, J. T., Wen, Z. L., & Cheng, Z. J. (200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Beijing, China: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2004).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Kawakami, K., Young, H., & Dovidio, J. F. (2002). Automatic stereotyping: Category, trait, and behavioral activ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3–15.
- Kelly, C., & Breinlinger, S. (1995). Identity and injustice: Explor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 41–57.
- Klandermans, B. (198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583–600.
- Klandermans, B. (1997).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Oxford,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 Klandermans, B., & Oegema, D. (1987). Potentials, network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Steps toward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519–531.
- Klein, O., Spears, R., & Reicher, S. (2007). Social identity performance: Extending the strategic side of SID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 28–45.
- Leach, C. W., Iyer, A., & Pedersen, A. (2007). Angry opposition to government redress: When the structurally advantaged perceive themselves as relatively deprive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6, 191–204.
- Li, A. S. (2006). On the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African policy. *West Asia and Africa*, (8), 11–20.
- [李安山. (2006). 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 *西亚非洲*, (8), 11–20.]
- Li, C., & Gong, X. L. (2006).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summarization.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 157–160.
- [李春, 宫秀丽. (2006). 自我分类理论概述.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1, 157–160.]
- Locatelli, M. G., & Holt, R. R. (1986). Antinuclear activism, psychic numbing and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5, 143–162.
- Mackie, D. M., Devos, T., & Smith, E. R. (2000). Intergroup emotions: Explaining offensive action tendencies in an intergroup contex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602–616.
- Mackie, D. M., Silver, L. A., & Smith, E. R. (2004). Intergroup Emotions: Emotion as an Intergroup Phenomenon. In L. Z. Tiedens & C. W. Leach (Eds.), *The social life of emotions* (pp. 227–2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kie, D. M., & Smith, E. R. (2004). *From prejudice to intergroup emotions: Differentiated reactions to social groups*.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Macrae, C. N., Milne, A. B., & Bodenhausen, G. V. (1994). Stereotypes as energy-saving devices: A peek inside the cognitive toolbox.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37–47.
- Martin, J., Brickman, P., & Murray, A. (1984). Moral outrage and pragmatism: Explana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 484–496.
- MyCOS Institute. (2011). *Chinese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annual report (2010)*. Pek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麦可思研究院. (2011). *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McLeish, K. N., & Oxoby, R. J. (2011).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the salience of social ident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2, 172–178.
- Mummendey, A., Kessler, T., Klink, A., & Mielke, R. (1999).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Predictions b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229–245.
- Neuberg, S., & Cottrell, C. (2002). Intergroup emotions: A biocultural approach. In D. Mackie & E. Smith (Eds.), *From prejudice to intergroup emotions: Differentiated reactions to social groups* (pp. 265–283).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Ratcliff, R. (1993). Methods for dealing with reaction time outli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4, 510–532.
- Reicher, S., & Levine, M. (1994). Deindividuation,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groups and the express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e effects of visibility to the out-group.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145–163.
- Reicher, S. D., Spears, R., & Postmes, T. (1995).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phenomena. In W. Stroebe & M. Hewstone (Ed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6, pp. 161–198). Chichester, England: Wiley.
- Roseman, I. J. (1984). 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emotion: A structural theory. In P. Shaver (Ed.),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Emotions,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Vol. 5, pp. 11–36).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chofield, J. W., & Pavelchak, M. A. (1989). Fallout from the day after: The impact of a tv film on attitudes related to nuclear wa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 433–448.
- Seger, C. R., Smith, E. R., & Mackie, D. M. (2009). Subtle activation of a social categorization triggers group-level emo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460–467.
- Shih, M., Ambady, N., Richeson, J. A., Fujita, K., & Gray, H. M. (2002). Stereotype performance boosts: The impact of self-relevance and the manner of stereotype ac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638–647.
- Simon, B., & Klandermans, B. (2001). 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319–331.
- Simon, B., Loewy, M., Stürmer, S., Weber, U., Freytag, P., Habig, C., et al. (1998).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646–658.
- Smith, E. R. (1993).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emotions: Toward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prejudice. In D. M. Mackie & D. L. Hamilton (Eds.), *Affect, cognition, and stereotyping: Interactive processes in group perception* (pp. 297–31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Smith, E. R., Seger, C. R., & Mackie, D. M. (2007). Can emotions be truly group level? Evidence regarding four conceptual criter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431–446.
- Smith, H. J., Cronin, T., & Kessler, T. (2008). Anger, fear, or sadness: Faculty members' emotional reactions to collective pay disadvantage. *Political Psychology*, 29, 221–246.
- Smith, J. R., Terry, D. J., & Hogg, M. A. (2007).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attitude-behaviour relationship: Effects of

- anonymity and accounta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7, 239–257.
- Spears, R., Lea, M., & Lee, S. (2011). De-individua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 121–134.
- Stürmer, S., & Simon, B. (2004). The role of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in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 panel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rman gay move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263–277.
- Tajfel, H.,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ur*. Chicago: Nelson Hall.
-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Reicher, S. D., & Wetherell, M. S.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Tyler, T. R., & McGraw, K. M. (1983). The threat of nuclear war: Risk interpretation and behavioral respons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9, 25–40.
-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504–535.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Fischer, A. H., & Leach, C. W. (2004).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649–664.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 Leach, C. W. (2008). Explor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llective action: Does relevance of group identity influence how people cope with collective disadvanta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7, 353–372.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 Leach, C. W. (2010).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dual pathway model analysis of coping with the climate cri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339–346.
- Vandenberg, R. J., & Lance, C. E. (2000).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literature: Suggestions, practic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3, 4–70.
- Wolf, S., Gregory, W. L., & Stephan, W. G. (1986).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rediction of intentions to engage in anti-nuclear war behavior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6, 310–321.
- Wright, S. C., Taylor, D. M., & Moghaddam, F. M. (1990). Responding to membership in a disadvantaged group: From acceptance to collective pro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994–1003.
- Yang, Y. (2005).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empirical studies" workshop's symposium. *Sociological Studies*, (4), 240–242.
- [杨宜音. (2005). “社会认同的理论及经验研究”工作坊召开研讨会. *社会学研究*, (4), 240–242.]
- Yopyk, D. J. A., & Prentice, D. A. (2005). Am I an athlete or a student? Identity salience and stereotype threat in student-athlete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7, 329–336.
- Yzerbyt, V., Dumont, M., Wigboldus, D., & Gordijn, E. (2003). I feel for us: The impact of catego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n emotions and action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 533–549.

##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Effects of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on Group-Based Emotions and Efficacy Paths

XUE Ting<sup>1</sup>; CHEN Hao<sup>2</sup>; YUE Guoan<sup>2</sup>; YAO Qi<sup>2</sup>

(<sup>1</sup>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China)

(<sup>2</sup>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 Abstract

Social identity, group-based emotions and efficacy are three major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affect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a collective action. Previous researches, focusing largely on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examined a single factor at a time and/o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factors in the offline collective action. Recent studies, however, extended levels and types of factor in their models and attended to the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The current study attempted to integrate the above three major factors by 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i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roup-based emotions, efficacy and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collective action.

Thre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In Study 1, 24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Tianjin City took part i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Diaoyu Island Event. Study 2 wa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Libya Event. and 48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6 different universities in Tianjin City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it. Both surveys included demographics in the first part, followed by a questionnaire on different social identities, group-based emotions and efficacies. Study 3 was an experiment 135 female undergraduat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ree different conditions, female identity primed group, school identity prim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articipants then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o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potential gender discriminations faced by job applicants.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using SPSS 13.0 and Lisrel 8.70.

Results indicated that group anger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offline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and efficac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offline and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The above effects were further moderated by different social identities. Specifically, identification with a large social category of event affected behavior tendency by moderating emotional path (and rational path some times),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affected behavior tendency by moderating rational path only.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people were rather rational in their participants of the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s.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identity;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group-based emotions; efficacy